

广东党史资料

第 六 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123974

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谭天度

广东党史资料

第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25 印张 177,7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50册

书号 11111·170 定价 1.5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党史重大事件 ·

中共南委、粤北省委被破坏的经过……………刘树新 (1)

· 革命回忆录 ·

遵义会议前后……………罗 明 (12)

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共东京支部……………陈 健 梁威林 (31)

琼崖革命斗争的回忆……………李黎明 (40)

我从事航空事业的最初岁月……………唐 铎 (103)

峥嵘的岁月 (三) ……………罗文洪 (114)

· 青年运动史料 ·

一九二六年的共青团中山大学支部……………陈修良 (151)

中国青年同盟的性质及其革命活动……………温焯华 (155)

广州的“一二·九”运动……………杨康华 (167)

关于突进社的情况……………刘天行 (172)

· 人物传记 ·

蔡和森传……………蔡 博 (181)

广东党 (团) 活动纪要……………李志业 叶文益 (198)

中共南委、粤北省委被破坏的经过

刘 树 新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中共粤北省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是广东党组织的一次重大事件。事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立即发出指示，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及时制止事态发展，保护了南方各地党的组织。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有关这一专题的材料整理发表，供同志们参考，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二年五至六月，中共粤北省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先后被破坏，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事变”后制造的又一严重反共事件。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春成立。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代表南方局领导中共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及湖南省的湘南特委、广西省工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和潮梅特委。

南委机关原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组织部长），组织部长郭潜（原江西省委书记，南委成立初期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为部长），宣传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有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有电台，负责联络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

一九四一年夏，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设在江西的特务机关“江西省调查统计室”（简称“调统室”），从已被捕叛变的原中共江西赣西南特委交通黄静玲、吉安地下党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森、江西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和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的详细供词中，了解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已到吉安，准备和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前往安福山参加省委会议；谢妻王勛和骆奇勋妻均隐蔽在吉安；李铁拐负有接西南特委李照贤上山参加省委会议的任务等重要情况。于是敌人迫使李铁拐带李照贤上山开会。七月十五日下午，谢育才、骆奇勋由交通员李铁拐带返回吉安。当谢育才和骆奇勋回到吉安时，当天遭到敌人秘密逮捕。骆被捕后不久便叛变，供出谢育才此行是到曲江南委办事处开会，顺便探望其爱人。以致隐蔽在吉安郊区的原江西统战部长林民风和谢育才爱人王勛也遭逮捕。

谢育才被捕后，敌人多次对他进行诱降未遂，于是敌人会同叛徒李盘森（李功珊）共同策划，采取欺骗的手法，由李亲自摹仿谢的笔迹，假以谢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要颜来吉安商讨工作。颜接信后信以为真，随即来吉安，以致颜及其随行武装人员均遭逮捕。不久颜也叛变投敌，并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特务卖命，成为参与破坏中共粤北省委、中共南委的祸首之一。接着，江西省委电台被破坏，省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在敌人和颜、李等叛徒的诱说下，电台台长林云生和全体人员也先后叛变。中统局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兼赣南视察员庄祖芳在安福山举办已叛变的原江西省委武装人员训练班，然后将这些武装人员编成特务行动队，队长李刚，叛徒孔昭新为指导员，叛徒李盘森为书记。从此，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已为江西特务机关所控制。

一九四一年八月，特务头子冯琦（原名徐锡根，系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叛变投敌，任中统局委员、高干会

主席兼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 亲临吉安, 会同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共同策划破坏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的庞大阴谋, 并通过江西省反动头子熊式辉向中统局长朱家骅作了汇报。一九四一年九月, 朱家骅为了支持冯琦的反革命活动, 直接拨给活动经费五万元, 并购买汽车一部。此时冯琦等特务头子一面对南委严密封锁消息, 将所有江西原中共人员与广东有关系的家属全部拘捕; 另一方面利用已经叛变的原江西省委工作人员以中共面目出现, 以电台的原来台长、报务员、译电员与南委电台联系, 按照南委规定的信号、波长、时间与密码对南委电台呼叫, 骗取南委信任。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终于与南委电台联系上了, 并以省委名义草拟假情况向南委报告。初时南委负责同志因江西电台近半年没有联系, 对此曾有怀疑。因此在开始通话时, 对电台工作人员作了如下规定: 一、查清是否江西省委电台; 二、查清后要江西省委将电台中断联系后的情况写出报告; 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发出任何指示或通知。自此之后, 这伙叛徒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发出不少报告, 终于骗取了南委的信任。一九四二年四月, 南委向江西省委发出通知, 要江西省委派人到曲江与南委来人联系。通知发出后, 南委派郭潜赴曲江准备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 由于这一重要决定为叛徒所窥悉, 给敌人有了可乘之机。

此时, 中统在江西的特务机关“江西调统室”和“特种工作办事处”的几个特务头子冯琦、张启白、庄祖芳等便集中精力, 千方百计企图诱迫谢育才秘密叛变。冯琦、章志纯(新调任调统室主任)、庄祖芳等多次找谢谈话, 软硬兼施, 迫谢就范。但谢育才未为所动。至一九四二年二月, “调统室”行动队长李刚按照庄祖芳的主意, 对谢育才爱人王勛施以酷刑, 逼迫他们自首。谢育才为应付敌人争取出狱而填写了自首书。

谢育才填写自首书后, 敌人立即要谢供述党的组织情况,

谢曾向敌人提供了一些已经公开了的情况。敌人疑其有诈，说谢供出情况一般，态度尚欠诚恳。为了有利于争取谢育才彻底叛变，乃由庄祖芳出谋，假将谢、王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城区庄祖芳寓所院内，在生活上给予优待。“调统室”派叛徒以照顾其生活为名，负责监视并继续诱说谢育才。叛徒颜福华找谢谈话时，将南委要将谢育才往曲江会晤郭潜的通知给谢匆匆一看，谢对此未置可否，态度含糊。颜对冯、章表示，仍有争取谢前去的可能，要求给他时间继续进行工作。在此期间，谢育才利用软禁在城区，戒备不象集中营那么严密的有利时机，准备与王勛越狱逃跑。

据王勛回忆：一天，颜福华叫谢育才到冯琦家，冯向谢提问“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在何处？又说：“我这里已与南委联系上了，南委要你（指谢）回‘全福处’。”谢育才为了应付敌人，想了一会，说：“全福是地名，是在闽西龙岩白土区，是老苏区。”（其实全福是张全福之名，在闽西南平和县工作的干部）并反问：“你给不给我去呢？”冯琦说：“你不能回去，我们已回电，说你去年八月在吉安被炸坏脑神经，现仍在医院里。”敌人为了考察谢育才是否真心自首，要谢提供有关闽西党组织的情况。谢预感南委危在旦夕，遂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深夜，与爱人王勛一起，趁看守人员一时疏忽，丢下未满周岁的婴儿越窗逃跑，奔向南委交通站所在地——福建省平和县（是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地）。翌日凌晨，敌人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公开通缉被我获得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于是下令秘密追捕，结果未获。（上述情况，我们从敌人反面材料中也找到反证。见郭华伦《中共史论》一书对南委的渗透与破坏部分）。

二

谢育才夫妇的逃跑，打乱了敌人的阴谋部署。敌特头目既

焦急又痛恨，互相埋怨，互相推脱。冯琦更是焦躁异常，因为他已向中统局许下可以诱迫谢育才叛变、彻底破坏南委的诺言，并且早已收下破坏南委活动经费五万元，惧怕中统局责难。经过一番争吵，终于由庄祖芳承担一定责任，向中统局作了汇报。当时江西省高干会（即调统室上面的指挥机构）和调统室冯琦、章志纯、庄祖芳等几个特务头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策^①。他们认为，谢育才如跑回南委，需要二十天至一个月。因此，敌人把破坏南委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已被骗取到的南委要谢育才五月中旬赴曲江与郭潜会晤的通知上面。于是，敌人临时决定提前对南委的侦破。五月上旬，调统室派特务、叛徒参加破坏南委的罪恶活动。这伙特务、叛徒是：李刚（中统江西调统室行动队长）、颜福华（原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军事部长）、孔昭新（原江西省委工作人员，郭潜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被器重的人物）、周必子（原是颜福华的保卫人员、认识郭潜）、罗卓明（原江西省委交通），连同其他特务共十多人，由特务头子庄祖芳率领，前往曲江，会同广东调统室及广东军宪警，妄图对南委及其下属组织进行全面破坏。

庄祖芳一伙到达韶关后，即与中统“广东调查统计室”主任谢修璋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委余建中等会合，在“广东调统室”配合下，利用骗到的郭潜地址，打着江西省委名义和南委设在韶关的接头地点联系。几经周折，终于和南委交通员取得联系，并约定接头的时间地点，事先作了逮捕郭潜的部署准备。与此同时，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得悉江西省委被破坏，便给郭潜发了电报，但郭潜接到电报时，没有及时将密码翻译及早撤退。所以，在五月二十六日，当郭潜在街上活动时，偶然为叛徒孔昭新、罗卓明发现，便立即报告庄祖芳前往追

^①上述资料见庄祖芳《一九四二年江西中统在粤破坏中共南委及粤北省委罪恶活动的经过》，1982年12月26日。

踪。当郭到韶关花园酒家吃饭时，立即被包围逮捕。接着交通员曾平、陈二叔以及南委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即周公）夫妇先后被捕。敌人得手后，当晚在中统“广东调统室”禁闭所——“基庐”对郭潜进行突击审讯。郭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终于成了可耻的叛徒，和敌人订成协议。协议大意是：

（一）要将从桂林领回的九万元（一说十万元）南委经费给他一万元（实际郭要了三万元）；（二）不公开其叛徒面目；（三）保证其人身安全等。敌人立即答应其所提出的全部条件。从此，郭潜就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①。二十七日凌晨，由郭潜引领特务到韶关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去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等人。二十七日早上，当敌人从李家回来路经五里亭车站，正巧和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相遇，以致饶也被捕。五月三十日，郭又向庄祖芳告密说：廖承志住在附近的乐昌县，他消息灵通，最好先把他逮捕。庄欣然同意，经过庄、郭等密谋商定，由郭写一字条诡称上级指示要廖立即去桂林安置疏散回来的文化人事宜，并由庄祖芳伪装南委交通员持郭潜写的字条和现款一万元带同特务行动队长李刚、特务陈文等于当天专车奔向乐昌，晚上庄祖芳等利用和廖接头之机，将廖承志秘密逮捕。六月五日，将廖承志押往江西太和马家州集中营^②。

五月底，敌人从南委发给通知郭潜撤退的电报中，获悉南委有所准备，是否前去破坏南委犹豫不决。后在叛徒郭潜怂恿和引领下，庄祖芳等遂于六月初，专车奔向大埔，以破坏我南委机关。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谢育才、王勘夫妇从江西狱中

^① 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四册九、十两节。

^② 见李刚《坦白材料》，原件存江西省公安厅档案室，抄件存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逃脱到达平和。翌日，南委得悉江西省委被破坏真相。南委负责人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决定，主要是：通知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角部分党员干部，立即转移到百侯（大埔县内一个圩镇）隐蔽待命，并火速电告在韶关的郭潜立即撤退转移，彻底清理文件档案，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去处，张文彬至兴梅往东江，涂振农绕道经饶平去潮汕；加强对电台武装保卫，主要机件拆卸运迁。方方转移到百侯，亲自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如情况有变化即向福建方面转移等。为了不引起混乱，避免群众猜疑，一切撤退转移工作均秘密进行。至五月底，南委所在地大埔角的主要人员已完全撤出，只剩下南委联络站“天成”布店，由两个店员支撑门面，掩护撤退。南委还专门派人到东江，并通过电台向粤北省委、重庆的南方局发出电报，要他们做好准备，因此当敌人到达大埔包围南委机关“天成”布店时，南委及下属机关电台全部工作人员均按预定撤退地点安全转移了，敌人妄图全面破坏南委的阴谋彻底破产。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则由于没有按照南委指定路线撤退，当郭潜带领特务奔向大埔角路经高陂镇，正与张文彬、涂振农相遇，以致张、涂及随行交通员被捕。高陂中学校长王道生（原高陂区委书记）和高陂交通站长杜国宗，也因郭潜出卖而被捕。

六月初，国民党特务庄祖芳一伙在叛徒郭潜引领下，包围南委机关大埔角扑空，另一股敌人包围方方同志原住村庄时，被当地群众发现，鸣锣打鼓，高喊捉贼，迫使敌人窜回大埔角，灰溜溜折返高陂，漏夜雇用拖船，押解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及交通员王亚华等慌忙窜回松口，把王道生交区署解送大埔县监狱，把张文彬、涂振农押送江西太和马家州集中营，和廖承志同一监狱。

七月九日，郭潜又引领特务前往广西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造成广西“七九”事件。

三

粤北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即由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即陈志华）采取了紧急措施：（一）立即派人分别通知各部和有关同志转移隐蔽；（二）通过省委电台电告南委和方方同志；（三）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报告粤北省委被破坏情况，请示应变办法。按照紧急部署，省委各部负责人饶彰风、黄康、李殷丹、陈能兴、张江明等及省委电台和下属组织的同志都分别安全撤退到东江部队、粤北、西江和桂林等地隐蔽，省委秘书长严重则留在韶关做善后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粤北省委来电获悉省委被破坏消息后，于六月八日发出“对南委行动的指示”，原文如下：“（一）不仅与江西而且与粤北断绝一切来往，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首求自保；（二）南委与承志及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包括邹、柳两人^①），他们的关系，我们另设法联络；（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避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你们直接管辖的下级党部暂作静止，不作声息，不做任何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又向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发出电报指示，指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做掩护，实行勤学、勤职、勤交友等“三勤”活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决定。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原粤北省委所属党组织由严重、陈能兴、张江明、王炎光、欧新和各特委负责同志冯燊、梁嘉、黄松坚、刘田夫、梁威林等分头到粤

^①即邹韬奋、柳亚子。

中、北江、西江和湛江等地传达贯彻，认真做好安全转移和隐蔽工作。南路特委得悉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后，经研究，认为事件与该地区关系不大，经向南方局请示，同意仍坚持活动，并加强安全措施，免受破坏。

在潮梅，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梅副特派员李平同志获悉，认为形势十分严重，便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切断与南委的一切交通联系，撤退潮梅与南委交通站有过关系的人员；提高警惕，做好必要准备，以防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并把情况火速通知在梅县的潮梅特派员林美南同志，同时决定派张克同志立即到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并向设在桂林的南委联络站负责人徐扬同志通报情况，以便采取应变措施。

张克同志到重庆后，将南委被破坏情况向周恩来、孔原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向张克指示采取三项紧急措施：（一）设法找到方方同志并把他隐蔽起来；（二）暂时停止组织活动；

（三）撤退和疏散干部，首先是有色彩的干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通知决定。

张克同志于九月上旬回到揭阳，先后向徐扬、林美南、李平并通过林美南向方方同志传达了南方局指示精神。南委负责同志根据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具体补充和部署：（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要留根子。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都必须留一条“根子”。要求“根子”在政治上可靠，政治面目没有暴露，能联系群众，任务是了解党员在停止组织活动期间的言行和思想工作状况，为将来恢复组织作好准备；（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进行，先撤退赤干^①，后为外地机要人员；（三）停止工作，组织分散，但下属要做好具体安置。对撤退路线、路条、路费以及隐蔽地点都做了具体部署。

^①即已暴露、有色彩的干部。赤干是红色的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和南委部署，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副特派员李平以及方东平、罗天、方向明、吴南生等分头向潮汕、兴梅等地各级党组织逐级传达，闽西南特委则由李碧山（李班）负责传达贯彻，切实做好撤退工作，从而保存了潮汕、兴梅、闽西、闽南等地党组织和大批干部，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摧毁我南方党组织的阴谋。

十月下旬，李平同志按方方指示，前往重庆向南方局周恩来、孔原同志汇报南委事件经过及贯彻执行南方局指示情况，经已圆满完成撤退任务。

方方同志部署南委所属各地党组织撤退后，即转移到梅县桃源，以商人身份隐蔽在地下党员家中，后又转移到福建边沿的农村（永定县峰市）。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深夜，被当地土匪约十人绑架，后经组织营救赎回，即转梅县经潮汕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南委所属各地党组织，绝大多数党员由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广交朋友，认真做好“三勤”活动，团结了广大群众，坚持共产党员本色。一九四二年底，中共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省临委成立后，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恢复组织的活动。一九四四年以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日寇侵占韶关，打通粤汉线时，各地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东江纵队和各地抗日游击队。粤北乐昌、坪石的中山大学地下党组织，先后动员大批党员和知识青年参加东江纵队，扩大发展抗日武装队伍。潮汕地区自恢复党组织活动后，也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知识青年和进步分子参加人民抗日武装，使潮汕游击队从几十人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千多人的韩江纵队。

综上所述，说明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对中共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后，发出一系列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措施是非常及时和有利的。周恩来同志又一次为党的事业立下了不朽的业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事件被捕人员中，虽郭潜、涂振农等极为少数的几个人叛变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绝大多数党员同志都能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廖承志同志在狱中英勇不屈，坚持斗争，最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张文彬同志在狱中长期和敌人斗争，英勇不屈，最后终被折磨死于狱中，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遵义会议前后

罗 明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中央红军长征至贵州遵义。党中央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当时，我在遵义听了林伯渠同志关于遵义会议意义和内容的传达，我们在场的同志听了都表示热烈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

遵义会议迄今已五十周年了。现在，我谨以自己经历的见闻和感受，写此《遵义会议前后》的回忆，作为热烈庆祝遵义会议所取得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前四年，是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在这四年间，存在着王明等对毛泽东等和广大党员同志的“无情打击”；也存在着毛泽东和广大党员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由于王明路线统治的压力大，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开始得到贯彻，因而取得重大胜利。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后，我任福建省委书记时，中央下通知调我到上海分配工作，我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到达上海。通过组织关系，得悉中央于一月七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是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

义”为理由来召开的。会上，王明等人指责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条更“左”的王明路线。通过这次会议，王明在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王明等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所谓“调和主义”的同志，又以反右倾主义为名，错误地打击了一直在白区坚持党工作的何孟雄等同志。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光荣牺牲。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同志为此事对王明极为不满。

会后，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来和我谈话，指责我在福建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我认为福建省委没有完全执行立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下旬，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福建省委主要常委认为：厦门、福州等中心城市的工运刚恢复不久，没有条件举行工人武装暴动，也不同意闽西苏区归广东领导及调红军打东江。所以曾将上列意见上报中央，结果被批评，说是“右倾保守”。八月六日在厦门成立五省行动委员会，举行飞行集会，犯了“左”倾的错误。但我们没有准备和举行工人武装暴动。事实证明福建省委没有完全执行立三路线。但是宣传部长却认为：福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就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立三路线。他警告我：如你不承认完全执行立三路线，就不分配工作。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否去闽粤赣边苏区参加武装斗争？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于四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目的地。我从中央宣传部长的谈话中，看出王明等执行王明路线，存在宗派主义，他们为了提拔亲信，凡对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干部，不论执行的程度如何，都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处分。对我如此，对其它各地的同志也不例外。当时，在上海反对王明和王明路线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有的被下放到工厂，有的中断党的组织关系。临时中央还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各省、各苏区去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在各地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志，“改选各级党的组织”，推行了王明路线，使各地党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的损失。